



当代中国学术文库
Contemporary China Academic Library

□ 熊敬忠 著



启蒙现实主义形态研究

QiMeng XianShi ZhuYi
XingTai YanJiu

中国书籍出版社

启蒙现实主义形态研究

QiMeng XianShi ZhuYi
XingTai YanJiu



中国书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启蒙现实主义形态研究/熊敬忠著.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1. 7

ISBN 978 - 7 - 5068 - 2525 - 2

I. ①启… II. ①熊… III. ①现实主义—文学流派研究—
法国—18世纪 IV. ①I565. 09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53918 号

责任编辑/ 王文军

责任印制/ 孙马飞 张智勇

封面设计/ 中联学林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邮编:100073)

电 话：(010)52257142(总编室) (010)52257154(发行部)

电子邮箱：chinabp@vip.sina.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3.25

字 数/ 24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 元

前 言

展望世界，当今时代的一切每时每刻在变化，新的生活方式和存在状态在不断塑造新的社会图像，不断召唤人们朝美好的前景迈进。已经翻阅的历史黄历，足以表明在过去的千年、万年里，人类从自然与自身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从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跨越农耕时代、机械时代到信息时代，不断加强了人类认知自然、改造社会、重塑自身的能力。但一切都是没有像人类进入二十一世纪那样，以如此快捷和多变的速率，使世界出于日新月异的更换之中。用目不暇接、五彩缤纷、万象纷呈来形容，都毫不为过。特别是互联网、卫星无线电传输、光缆等为当代社会信息传递提供了新的方式。这样，“新兴的信息和传播技术为实现全球传播提供了可能，并逐步融入一种私有化的全球传播建构。新技术所营造的‘时空压缩’为媒体和电信企业在作为新自由主义体系的一部分的全球市场上经营提供了方便。”^① 它无疑是“全球化”的技术策略——信息与技术构建的“地球村”。“地球村”使人类的经济、政治、文化和交往关系处于崭新的结构之中。

进入当代，人类在认识自然、改造环境、建设社会、提炼自我的征程上步伐迈得越来越快。如果说马克思在十九世纪评价资本主义的进步性时曾说：资本主义在短短的时间里，创造了比以往一切时代还要多的生产力，似乎有点浪漫情绪的话，那么，在二十一世纪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所体现出来的创造力和生产潜力，大大超过以往时代，却是实在的形势。伴随“全球化”浪潮，文化“全球化”以前所未有之势，悄然改变着人类的文化生存模式、心理状态和感觉方式。从而在一种新的文化范式下处理复杂的社会关系、交往关系和自我关系，但同样带来了难以预料的危机和灾难。殖民、战争、种族冲突、民族

^① [英] 达雅·K·萨苏：《全球化时代的国际传播》，黄瑞译，《全球化与大众传播——冲突·融合·互动》，尹鸿 李斌主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75页。

矛盾，环境恶化等等严重的世界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愈演愈烈。文化冲突、新世纪焦虑、精神的颓废、人性的堕落和价值观的迷失等等消极面，作为“全球化”的危机的感应现象，也呈现出不断加剧的态势。

经历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国不断融入“全球化”之中，取得了巨大成就，也遭受到“全球化”危机的严峻冲击。我们注意到：国人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生存状况大为改观的同时，精神和文化、价值和心理却在呈现多元化的样式。多元化并非全部体现在积极的层面上，而是在他者文化、传统文化和商业社会文化的多重碰撞下，表现为复杂、多层次、混合的等多元因素参与的形态。

作为文化的审美形式，文学正处在千年世纪的转折关口。就中国文学而言，一方面在“全球化”背景下，已纳入世界文学的整体之中，成为它的有机构成部分，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同时，在对世界文化的吸收和本土文化的创新过程中，也经受着严峻考验。文学的审美精神、表述方式、价值追求和意义阐释发生显著的改变。顺应这种改变，在文学创作、理论构建与文学批评方面，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气象。特别是对于传统审美范式形成了强烈的冲击，文学写作的非经典叙述、理论构建的西方话语借鉴、批评视角的文化转向，表现尤为明显。在一定程度上，这构成了对传统的颠覆。这种颠覆性的价值指向，为现代、后现代文学叙述语境的形成提供了有利条件。不可否认，新的话语形式、叙述语境确实为实现文学的多元化场景，回应世界文学艺术思潮，贯彻文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产生了积极效应，使文学在不断回复人性的轨道上，迈开了巨大步伐。但是，中国文学在同质化危机的侵蚀下，也在消磨着文学审美方式的神圣气质，文学面临非文学化的危险！危险的信号，体现在文学经验上，就是重个体欲望的宣泄，排挤文学的历史性、消解文学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人性启蒙的责任、瓦解文学的社会批判职能、泛化文学形式；体现在文学理论上，一味追求译介理论、离弃经典话语、拆散阐释系统；体现在文学批评上，把市场运作机制渗入批评领域，使文学批评世俗化，亦或非文本化与泛批评化。基于这种背景，在面对现实的同时，我们是否需要对文学传统与文学的历史做出深刻的反思呢？在我看来，今日中国经济的腾飞、社会的和谐、文化的繁荣，国家和民族的现代化旅程，这是伟大的选择。可是中国悠长的历史传统，特有的民族秉性，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是否已经消失了呢？或者说，我们是否已经完全实现了整体的社会转型呢？回答是否定的。事实上，我们还没有完全融入全球化，我们还需要对传统进行再度反思，文学还有必要对民族心灵深处的文化意蕴进行揭示。就文学理论而言，我们有

必要对传统命题展开新的探讨。如此选择的目的，是为了弘扬一种对文学理论的关注意识，形成一种新的召唤结构。启蒙现实主义，是这种关注情怀的努力尝试。

就一般现实主义形态来说，文艺理论界做过很多研究，形成了众多成果。这些成果对于深化现实主义创作和文学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只有开辟现实主义形态探讨的新视角，才能进一步丰富、升华这一命题的内涵。从启蒙视野来审度现实主义形态，无疑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这里，有两个向度为命题研究提出了要求，一是启蒙如何对现实主义产生影响，二是现实主义在其演变历程中，充分渗透了启蒙精神。与一般层面上现实主义形态研究相比，启蒙视野对现实主义形态给予了限定。从这一限定中，我们一定能找到现实主义形态并非只有一般的研究视角，它还具有特殊的阐释空间。由于启蒙与现实主义的交织，我们必须考虑启蒙的多元转化对现实主义形态的建构，亦或话语方式的改变，我们必须有新颖的方法才行。

二元分析方法是我们进行启蒙现实主义形态研究的方法论，也是研究方法创新的建设性尝试。所谓二元，是指具体的两个研究对象，即启蒙的两个向度：古典启蒙与现代启蒙；启蒙的标杆——理性，呈现为理性与非理性；现实主义的基本形态与转换形态。它们在对接和融合的互动中，一方面每个对象自身显现出两项转化的可能状态，另一方面两个对象处于动态的构建时，不断显现出外在和内在的碰撞和融洽，形成一种对话的运行机制。二元，不是指对象的正反两面，我们更强调的是，二元是对象的活动状态显示的两个维度。两个维度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决定论，而是影响论与建造论。二元体现为历史的演变过程，它有丰富的历史和现实的多重因素参与其中。这使得它们在演变历程中改换表述机制的形式，从而不断实现本身的超越和再造。从活动论来看，启蒙以其强烈的生命力，不断跨越时空的隧道，在与其它思潮的交接和媾和中，不断辐射和流转。现实主义形态的启蒙向度在这种变迁中，更加鲜明、不断强化了生命力和穿透力。运用这一方法，本书结构是这样展开的：绪论对启蒙话语和现实主义连接的历史背景以及当下我国重新探讨这一问题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做了考察，上篇与中篇就启蒙对现实主义二元形态的构建做了纵向和横向思考，下篇研究了在我国特定历史时期启蒙的生发以及现实主义形态的联系和实现机制。本书在整体上力图体现反思、批判和重建的结构思路。

文献综述、研究状况与研究方法

在启蒙现实主义形态研究上，从两个不同的方面展开。就是侧重探讨启蒙

问题以及启蒙与文化，尤其与人文精神的关系，通过反思、批评和重建，力图揭示启蒙哲学精神在时代发展中的流转对文化建设的积极效应。也可能结合文学思潮在多元选择的进程中，如何体现对启蒙的追求和呼唤，或者在更高的层面上，体现文学的启蒙价值。另一个方面，就是探讨现实主义作为一种重要的创作方法与文学思潮，在文学史中的演变以及它与其它文学思潮交互递进的关系。这样研究的积极意义在于：重视了专业问题的研究，把在“全球化”背景下被学术界轻视的基础理论问题再度提到桌面，进行富有时代特点的探讨，引起研究界的关注。像现实主义文学经验，由于它与现实生活的紧密关系，无论时代怎么样变迁，总会以各种形式表述出来，那么它在不同时代是如何传递、又怎样承载时代的文学使命、又怎么与其它文学表现方法发生联系的、自身的审美机制又会发生怎样的变形等等，都需要经过细致的理论梳理，把它的审美经验提炼、总结出来。这种总结需要相当的哲学、文化考辨。这样，现实主义文学研究实际上对应了文化研究。

就目前资料来看，第一个方面的材料，除哲学史、文化史论著涉及到启蒙思想的阐述外，E·卡西勒的《启蒙哲学》，是一部系统论述启蒙运动时期哲学思想的专著。它对启蒙时代的精神，对启蒙思想家在几乎一切知识领域——自然科学、心理学、认识论、历史、宗教、法学、政治以及审美活动等作了清晰而生动的描述。E·卡西勒希望把启蒙哲学还原为一种方法论，用译者的转述来说：“在启蒙思想千差万别的活动中，有一个作为这些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属的清晰可辨的中心：启蒙思想抛弃了十七世纪形而上学的抽象演绎的方法，而代之以分析还原和理智重建的方法。启蒙思想家不仅把这一方法论工具运用于心理学和认识论领域，还把它运用于历史、宗教批判、法和国家以及美学领域……这种分析重建法正是启蒙哲学的最根本的方法论特征，也是被启蒙运动树立为旗帜的‘理性’这一官能的真正功能之所在。”^① 这部论著的主要缺陷在于过份强调方法，忽视了启蒙哲学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启蒙哲学是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实践性的，因此不免产生空疏之感。启蒙是一个跨越时空的精神之魂，从启蒙运动发生以来，关于启蒙的探讨没有断裂，它在不同的时代和文化语境下，呈现出多样的阐述形式。江怡主编的《理性与启蒙——后现代经典文选》，选取了欧美十八至二十世纪最具代表性的思想家关于启蒙问题的论述，材料翔实，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置于现代性背景的审视之下，詹姆斯·施密特编的《启蒙运动与现代性——十八世纪和二十世纪的对话》，通过选取

^① 顾伟铭：《启蒙哲学·译者前言》，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

权威的启蒙论述，体现了编者把启蒙看成一个现代性的话语机制的选编取向。此外，斯坦利·罗森的《启蒙的面具——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专门研究了尼采哲学思想在启蒙转化，即把启蒙从经典启蒙转化为现代启蒙中的重要性。汪民安，陈永国编的《尼采的幽灵——西方后现代语境中的尼采》，也为我们提供了关于尼采在后现代视境下被解读的经典论述。还有当代青年学者对启蒙问题的研究，吴光主编的《中国人文精神新论》，张宝明的《二十世纪：人文思想的全盘反思》，是代表性论著。

现实主义作为创作方法和文学思潮的研究。就目前形势来看，探讨这一问题的专著不是很多。温儒敏的《新文学的现实主义流变》、张德祥的《现实主义当代流变史》、张学正的《现实主义在当代中国》、崔志远的《现实主义的当代中国命运》、钱中文的《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等是专门研究现实主义问题的。张光芒的《中国当代启蒙文学思潮论》、方维保的《当代文学思潮史论》、张永清主编的《新时期文学思潮》等很多文学史著作，在宏观审视文学思潮史时，对现实主义进行了富有特色的阐述。古远清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从文学批评理论史的视角对新中国成立至八十年代末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实践进行了系统总结，涉及到现实主义流变的种种情形。柳鸣九主编的《西方文艺思潮论丛：二十世纪现实主义》《西方文艺思潮论丛：自然主义》《西方文艺思潮论丛：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为研究外国现实主义文艺思潮和理论，提供了直接材料。但这些专著或资料汇编都不是从哲学、文化层面来探讨现实主义问题的，而是从创作和文学经验结合的视野来谈现实主义的，是一种描述和评论联系在一起的文学研究工作。另外，从论文来看，八十年代出现了一个研究高峰。近些年来，探讨现实主义的论文，据论者尚不完全的统计，有数十篇。与高峰期比，明显式微了。现实主义偏离了研究的中心视线。

从以上回顾来看，把启蒙现实主义形态作为组合命题进行文学理论研究的工作，可大力开拓。对此，论者试图作这方面的努力，即使谈不上创新，至少也是一种探索。而且还可以以这一探索为出发点，推动其它文学理论研究对象开辟新领域。

审视研究对象，其中离不开方法，方法又影响研究对象。对象和方法的统一是动态的建构过程。研究启蒙现实主义形态，论者以二元分析为考察问题的首要方法，设计了本书的基本框架。再从这一框架出发，在文章逐步展开的过程中，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区域论述问题。我们清楚，任何研究的进行都是多样方法综合运用的结果，而且多元方法综合得越好，越能达到预期或超预期

的效果。文章中，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抽象与具体的统一、分析与综合的统一，宏观与微观的统一，辩证的分析思路、比较的方法等等，尽可能做到较好的兼顾。

目 录

CONTENTS

前 言	1
绪 论	1
第一章 启蒙话语与现实主义 / 3	
第二章 现实主义启蒙语境 / 19	
上 篇 古典启蒙与现实主义基本形态	43
第三章 启蒙现实主义创作论 / 44	
第四章 启蒙现实主义文学批评论 / 66	
中 篇 现代启蒙与现实主义转换形态	84
第五章 激进的现代启蒙 / 87	
第六章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启蒙反思 / 115	
下 篇 启蒙现实主义形态中国化	141
第七章 启蒙现实主义与文化选择 / 144	
第八章 启蒙现实主义形态转向 / 168	
结 语	188
参考文献	191
后记	196

绪 论

当下文学理论研究处在世纪转型的多元演变之中，这既是文学创作呈现多元化样态的实际情形使然，也与理论与文学经验的交互影响以及理论方法的多样选择存在密切联系，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说，进入新世纪的八年来，文学界来不及对文学经验和理论研究的整体状况进行系统梳理，更难以从文化层面上对这种多元现象做出优劣的价值判断，即使在做出价值判断的时候，人们也不可能像过去那样，采用同一的标准。因为当下的文学在逐步融入全球化的轨道，而全球化对文学产生的影响在短时间里是难以估算出来的。与上世纪新时期以来文学状况相比，新世纪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不再处于经验匮乏与理论过剩的对立之中，而是处于经验表达与理论创新的互动中，它们形成某种对应或错位的召唤姿态，即新的文学经验也许可用某一理论进行解释与评判，也许找不到解释这种经验的理论方法，但并不是由于理论方法匮乏，只是理论不能与之配套，也可能是理论方法更新过快，文学经验无法跟上，理论就变成了游离的东西。这都无妨于它们的存在，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状态潜藏着对话和争鸣的巨大可能性。

那么，新世纪文学的这种情形是否意味着它在走向辉煌呢？亦或文学的繁荣就是完全以多元化或者表面上的创新为唯一标志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对于文学来说，它的价值需要经过历史的验证，更需要经受审美标准的考验。而从当下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的研究来看，同样面临着全球化带来的危机。文学正日益陷入商业化的规范之中，成为交易的产品。文学的神圣性，理性，忧患意识、干预生活的勇气，关注人生的情怀，批判和反思精神在不同程度上被消解。我们发现，在经历了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人文精神讨论之后，关于文学的启蒙精神，关于人道主义主义的思考，没有再引起文学界的重视。事实是，新世纪人们的精神迷失和价值观、道德观、人生观紊乱却是明显存在的。现实主义作为创作方法和理论形态，曾经成为讨论的热们话题，是否在当下的现实情境

中丧失了存在的可能性？在我们看来，传统命题仍然还有牢靠基石，当我们再度审视它的时候，一方面会促进对文学史的反思，弘扬传统理论。另外，通过传统命题的探讨，引导文学创作和研究朝健康的方向前进。我们选择启蒙现实主义形态研究为论题，旨在把启蒙与现实主义联系起来，穿越以往对现实主义的一般性探讨，建立现实主义形态的特定模式。从较高的意义上说，这一模式是进行社会批判、历史反思、唤醒人类良知、重建启蒙、探讨新艺术形式的理论形态。

第一章

启蒙话语与现实主义

“启蒙”在文化理论中无疑是引人注目的常见词，在不同语境下，具有不一样的涵义，而其基本涵义有两个：广义的启蒙和狭义的启蒙。广义的启蒙指对处于无知、愚昧、麻木等状态的人和社会群体进行启发、教育、开导，使他们变得明智、聪慧起来，狭义的启蒙指启蒙运动体现的启蒙文化精神。本书选用的启蒙是狭义的启蒙。作为思想史上伟大的时代潮流，启蒙运动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启蒙运动确立了一套特殊的话语体系，也开辟了新的思维方式，它们成为人类社会迈向新历史征程的精神指南。现实主义与启蒙话语的联系，就是指现实主义借鉴启蒙的文化精神，形成自己特殊的形态阐释方式，或者指在具有明显启蒙特征的特殊历史时期，现实主义如何在启蒙影响下，构造特定的表述机制。我们将在这一章里，讨论启蒙话语的产生与特征，以及启蒙现实主义形态的基本构成因素。

一、关于启蒙

作为思想解放运动，启蒙运动是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以后出现的又一次伟大的文化革新思潮，但涉及的范围，影响的广度和深度，比前几次要广泛、深入得多。启蒙运动所体现的精神，今天仍然是我们必须继承和发扬的，有学者指出：“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历史事件，启蒙运动早已结束，但作为一种理性批判精神，启蒙运动则是永存的。哪里有愚昧，那里就需要启蒙，只不过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愚昧，因而也就有不同的启蒙要求而已。”^① 我们从以下几个层次来分析启蒙运动及启蒙文化精神。

^① 彭越 陈立胜：《西方哲学初步》，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02页。

1. 不断言说的启蒙

关于启蒙运动，在康德的历史性总结中有过一段经典的论述：“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了。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的口号！”^① 他进一步指出：“必须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并且惟有它才能带来人类的启蒙。”^② 这就提出了对人进行启迪的严肃问题。如果人类缺乏足够的信心与勇气，就不能从蒙昧和愚钝的状态下解放出来，社会就不可能进步。

正是因为启蒙运动把人类脱离愚昧状态，以及自身的解放和发展放作为自己的活动的目标，它在思想史上就产生了异乎寻常的影响。毫无疑问，启蒙运动以它鲜明的口号和实践，把人类引导到不断认识自我、反思历史、改革社会、不断寻求解放的征程上去。直到二十世纪，智慧的思想家仍然把启蒙看作是推动历史发展不可或缺的精神动力，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重新树立起启蒙的精神旗帜。在格奥尔格·皮希特那篇著名的演讲《什么是启蒙了的思维？》中，认为启蒙：“只有作为历史进程才能得到理解，也只有在历史进程中才能实现，所以不可能把启蒙局限于某个单独存在的领域，比如单个的个人和宗教的关系之类。进行启蒙就是同时在所有领域进行启蒙。在宗教中，启蒙表现为良心和理性反对教权主义和正统，表现为争取宽容，拒绝迷信和宗教裁判。在政治领域中，启蒙表现为争取自由、平等权利和公共福利，反对特权者的任意妄为和专制。在自然科学中，启蒙意味着经验主义和机械论、技术以及科学的扩张。在一般意义上的科学中，启蒙意味着把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运用于对可知世界的全部考察中。在哲学中，启蒙表现为摆脱神学的监管，表现为抗拒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表现为对意识的分析和哲学人类学。”^③ 美国克拉克大学教授刘易斯·亨奇曼认为：“二十世纪的政治图景之所以变得如此复杂，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理想、理论、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从早期历史延续至今的那种方式。”因为启蒙运动“连同文化和教育，是‘社会生活’的几个方

① [德] 康德：《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回答：什么是启蒙？》，《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22页。

② [德] 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1990年第24页。

③ [德] 格奥尔格·皮希特：《什么是启蒙了的思维？》，《启蒙运动与现代性—十八世纪和二十世纪的对话》，[美] 詹姆斯·施密特编，徐向东 卢华萍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79页。

面。它们代表了改善我们的社会条件的一些努力。”^① 因此，启蒙运动以及延异向度，即是一个历史的话题，也是一个当下的命题。当代世界处在一个变化不断加剧的时代，各种文化裂变、交锋、融合处于不断整合之中，面临着生态问题、民族问题、宗教问题、政治问题、伦理问题等等，仍然还需要启蒙精神，并对它们进行理性、深入、全面的思考和批判，需要为重新树立人道的、和谐的、生态的世界环境和发展空间摇旗呐喊。

2. 思想史链条上的启蒙

任何伟大的解放运动都不是在单一的、现存的条件下发生的，而是在以往的历史条件中已经孕育但还没有完备、还不够发生的充分基础，而现存社会继承了这些条件，恰好形成了发生的外在因素，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就爆发了。启蒙运动就是在这样的情境下发生的。启蒙运动在思想史链条上，批判继承了以往历次文化思潮的积极成果，又对以后思想史上的伟大变革产生了巨大影响。启蒙思想家达朗贝尔在《哲学原理》中兴奋的预见了这场运动的情形：

如果细致考察一下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十八世纪中叶，考察一下那些激励我们，或者至少也对我们的思想、风俗、成就甚至娱乐活动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事件，就不难看出，我们的观念在某些方面正发生一种极显著的变化，这种变化的速度之快，似乎预示着一种更为强大的转变即将来临。惟有时间才能告诉我们这场革命的目标、性质和范围，后人将比我们能更好地了解它的缺点和功绩。……一种新的哲学思维方式的发展和运用，伴随着这些发现而来的那种激情，以及宇宙的景象使我们的观念发生的某种升华，所有这些原因使人们头脑里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亢奋。这种亢奋有如一条河流冲决堤坝，在大自然中朝四面八方急流勇进，汹涌地扫荡挡住它的一切。……于是，从世俗科学的原理到宗教启示的基础，从形而上学到鉴赏力问题，从音乐到道德，从神学家的烦琐争辩到商业问题，从君王的法律到民众的法律，从自然法到各国的任意法……这一切都受到了人们的讨论和分析，或者至少也都是被人们对某些问题有新的认识，而在另一些问题上却投下了阴影，正像涨潮落潮会在岸边留下一些东西，同时也要冲走一些东西一样^②。

这一预见后来得到了证实，并在很多方面超越了他的预期。启蒙运动正是在物质世界、精神世界、国家和社会三个领域，发挥了历史性作用。但他没有

^① [美] 刘易斯·亨奇曼：《自主性、个性和自我决定》，《启蒙运动与现代性—十八世纪和二十世纪的对话》，2004年第496页。

^② [德] E·卡西勒：《启蒙哲学》，顾伟铭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2页。

揭示出为什么在十八世纪会发生这种转变，没有分析发生这一转变的以往历史条件，这个条件恰恰是不可忽视的。不可否认，启蒙口号是启蒙运动这一特定时代的标志。但对于启蒙的追求，远远在启蒙运动之前。因此，不联系启蒙运动发生的各种历史文化条件来谈启蒙，会产生割断思想史链条的消极后果。

思想史链条上的启蒙，是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近代科学思潮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对此又有所超越：“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思潮都是人类思想解放运动，就此而言，都有反对愚昧的启蒙色彩。但启蒙运动这个主题更为鲜明，更为突出，它汇聚了上述运动的成果，并把启蒙的旗帜高高举起，推向社会，因而影响更为广泛。”^① 启蒙运动能产生如此大的社会效果，它吸收和扬弃了这些历史条件提供给它的什么因素呢？

文艺复兴对人本和理性的突出强调，开创了以人为中心的时代。而对人本的呼唤，是建立在反封建、反教会、反愚昧的前提下的，它开启了一场浩大的反中世纪文化、回归世俗的启蒙思潮。文艺复兴标志着人类正朝现代文明的轨道迈进。文艺复兴的人文精神、文化与知识的崇拜、理智的追求、世俗化的人生价值取向、叛逆宗教的情绪，对启蒙思想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马丁·路德、加尔文为代表的宗教改革，把人们从宗教原罪的愚昧状态中呼唤出来：“没有人能凭一个礼物就保证了他将获得拯救，就算那是一位主教授予的，因为，即使是上帝的恩典也不能给予这种保证。”^② 这一宣言警示人们：宗教并不是拯救灵魂的灵丹妙药，只有自己才能拯救自己，而自我意识的觉醒是自我拯救的关键。在路德看来，这个自我拯救的关键是对《圣经》的虔诚信仰，而不是来自天主教的精神教化。如果说天主教把人的肉体和精神进行双重钳制的话，那么宗教改革就是要把人从肉体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转而复归心灵的信仰。宗教改革对启蒙运动提出的个性解放、树立人的信仰产生了很大影响，因之，“启蒙思潮乃一种表里如一的反基督教运动……启蒙思潮乃一次大规模的思想的群众运动。”^③ 但正如马克思评价的那样，宗教改革把“肉体从人的锁链中解放出来，但又给人的心灵套上了锁链。”^④ 近代科学思潮以笛卡尔、牛顿、洛克、莱布尼茨为代表。他们提出了科学的思维方法，主张以严谨、缜密

^① 陈刚：《西方精神史—时代精神的历史演进及其与社会实践的互动》（下），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62页。

^② [德]马丁·路德：《文艺复兴书信集》，李瑜译，学林出版社，2002年第150页。

^③ [美]布林顿：《西方近代思想史》，王德昭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66~167页。

^④ [德]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9页。

的认识方式研究自然、社会，改变了过去盲从、迷信的思维传统，把理性放到了思维方式的首要位置。这为启蒙主义重建理性提供了直接的方法论指导，使启蒙运动获得了坚持科学原则的新宇宙观。另外启蒙运动还继承了新古典主义某些因素，并在对新古典主义的批判中，改造了它的理性概念和僵化的诗学结构模式。同时，十七、十八世纪欧洲相对浓厚、宽松的文化环境，也为启蒙运动巨大浪潮的兴起提供了较好的外部条件。启蒙运动作为思想史链条上的一环，就它这一时代而言，掀起了涉及到自然、宗教、历史、政治、法律、国家、社会、美学等几乎全部领域的启蒙浪潮，而及其后，启蒙精神的影响延绵至后启蒙时代、浪漫主义运动、批判现实主义以致现代主义与当今时代。启蒙运动结束了，启蒙精神和启蒙使命没有结束，它在不同的时代条件下，在不断变换的启蒙观念中，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3. 启蒙的文化精神

创建启蒙的文化精神，开辟人类文化新纪元，是启蒙运动的重大历史任务。启蒙思想家大多是精通数种语言、学识渊博、人生阅历丰富、专业领域广阔，具有坚强的意志、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的文化战士。他们（尤以“百科全书派”为杰出代表）通过艰苦的努力，在众多领域创造了人类思想史上的辉煌时代。

启蒙的文化精神，与启蒙运动的显著特点相联系。启蒙运动的显著特点在于：把理性作为主要价值坐标，提出了“回到自然”的口号，追求自由，重视文学艺术的教化、伦理、审美功利等等。我们以这些特点为出发点，把启蒙的文化精神归纳为科学精神，人文精神与文学精神。我们把理性归结到科学精神，“自然”和自由归结到人文精神，文学艺术的审美功利归结到文学精神。

理性的科学精神。理性作为人类心理结构以及一种文化阐释的建构模式，几乎伴随着人类文明史的进程。谈及古希腊文明时，我们称古希腊人为理性主义者，把他们的思考方式称为“逻各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也很注重理性，新古典主义主义者把理性作为唯一的文化建构机制，近代科学思潮则以理性为科学的推论原则，在经验主义和唯理主义者那里，理性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重视。但还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像启蒙运动那样，把理性提到文化哲学的高度，以理性作为这场运动的旗帜。拉美特里认为：“理性心灵具有一些比心灵广阔得多的机能。”^① 达朗贝尔乐观的相信：理性之光“将逐渐地、不知不觉

^① [法] 拉美特里：《心灵的自然史》，《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234页。